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五編 13

日治時期臺灣醫事作家 及其作品研究 (下)

以蔣渭水、賴和、吳新榮、王昶雄、詹冰為主

林秀蓉·著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 編輯刊

五 編

第 13 冊

日治時期臺灣醫事作家及其作品研究——
以蔣渭水、賴和、吳新榮、王昶雄、詹冰爲主(下)

林秀蓉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日治時期臺灣醫事作家及其作品研究——以蔣渭水、賴和、吳新榮、王昶雄、詹冰為主（下）／林秀蓉 著——初版——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 103〕

目 4+196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五編；第 13 冊）

ISBN：978-986-322-645-1（精裝）

1. 臺灣文學 2. 日據時期 3. 文學評論

733.08

103001766

ISBN-978-986-322-645-1



9 789863 226451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五 編 第十三冊

ISBN：978-986-322-645-1

日治時期臺灣醫事作家及其作品研究——
以蔣渭水、賴和、吳新榮、王昶雄、詹冰為主（下）

作 者 林秀蓉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3 月

定 價 五編 24 冊（精裝）新台幣 4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日治時期臺灣醫事作家及其作品研究——
以蔣渭水、賴和、吳新榮、王昶雄、詹冰爲主(下)

林秀蓉 著



目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國內外醫事作家及其作品觀察	1
一、歐、美、亞	1
二、臺灣	4
第二節 醫學與文學的交會	18
一、皆以關懷人類的生命為本質	19
二、醫學訓練對作家的影響	22
三、精神分析學與文學的相關性	24
第三節 研究範圍	26
一、作家身分與取材	26
二、時間界定：一八九五～一九四五	29
第四節 研究目的與方法	30
第二章 日治時期臺灣醫事作家的醫學教育及社會參與	35
第一節 日治時期臺灣的醫學教育	35
一、臺灣醫學校的創設	37
二、留日學醫的風氣	41
第二節 日治時期臺灣醫事作家與反殖民運動	43
一、臺灣同化會、復元會	43
二、臺灣文化協會（一九二一～一九二七）	46
三、臺灣民眾黨（一九二七～一九三一）	54

第三節 日治時期臺灣醫事作家與新文學運動	61
一、萌芽期（一九二〇～一九二七）	62
二、成長期（一九二七～一九三二）	65
三、高潮期（一九三二～一九三七）	69
四、戰爭期（一九三七～一九四五）	72
小 結	79
第三章 作家的文學歷程	81
第一節 監獄文學的驍將——蔣渭水	81
一、漢文奠基期	83
二、「臺灣文化協會」始創期	84
三、「治警事件」入獄期	85
四、在臺灣新文學史上的地位	93
第二節 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	94
一、漢詩期	94
二、新文學期	96
三、回歸期	100
四、在臺灣新文學史上的地位	102
第三節 鹽分地帶文學的領導人——吳新榮	104
一、漢詩期	105
二、散文期	106
三、新詩期	110
四、戰前戰後文類的轉變	114
五、在臺灣新文學史上的地位	116
第四節 打開戰爭期的心窗——王昶雄	117
一、戰前	118
二、戰後	122
三、戰前戰後作品風格比較	123
四、在臺灣新文學史上的地位	125
第五節 圖象詩人——詹冰	126
一、戰前	127
二、戰後	131
三、戰前戰後作品風格比較	133
四、在臺灣新文學史上的地位	139
小 結	140
第四章 作品的抗日主題	143

第一節 批判警察制度的威權	143
一、斂財索賄	145
二、欺凌弱小	146
三、貪戀美色	147
四、執法不公	147
第二節 譴責資產階級的剝削	151
一、製糖會社的壓榨	152
二、傳統地主的逼租	158
三、資本家的掠奪	161
第三節 揭櫫正義真理的史詩	164
一、二林蔗農事件——以賴和〈覺悟下的犧牲〉為例	169
二、霧社起義——以賴和〈南國哀歌〉、吳新榮〈霧社出草歌〉為例	171
三、勞工運動——以吳新榮〈五月的回憶〉為例	175
第四節 抗議皇民政策的心聲	177
小 結	180

下 冊

第五章 作品的醫事主題	181
第一節 診斷「臺灣」病症	182
一、迷信深固	184
二、風俗醜陋	186
三、診治處方	191
第二節 反映民眾亂服秘方	194
第三節 揭露療疾致富的社會價值觀	200
第四節 塑造醫生形象	206
一、醫人醫國型	208
二、以文學為情婦型	210
三、身體醫兼心理醫型	213
第五節 描述行醫體驗	216
一、從實習到開業	217
二、法律干涉醫業	219
三、呈現醫療環境	220

四、改善醫界建言	222
小 結	224
第六章 作品的藝術成就	225
第一節 醫學語言的運用	226
一、以醫學診斷書為形式結構	227
二、以「血」、「器官」為意象	228
第二節 心理活動的描寫	235
一、原我性格的描寫	237
二、自我性格的描寫	238
三、超我性格的描寫	241
第三節 以死亡為悲劇架構	242
一、死亡悲劇的肇因	242
二、死亡悲劇的寫作特色	245
三、死亡悲劇的意義	253
小 結	254
第七章 社會參與及主題表現的傳承	257
第一節 社會參與的傳承	257
一、參與政治社會文化運動	258
二、延續臺灣文學的香火	262
第二節 主題表現的傳承	267
一、「政治面向」的現實關懷	267
二、「社會面向」的現實關懷	280
三、「醫事面向」的現實關懷	289
小 結	304
第八章 結 論	305
第一節 作家的社會意義——實踐知識分子的社會關懷	306
第二節 作品在臺灣文學史上的定位與價值	310
一、傳承現實主義的臺灣文學精神	310
二、另闢臺灣文壇醫事寫作的新方向	314
附錄一 日治時期臺灣醫事作家生平年表與作品繫年	317
附錄二 日治時期臺灣醫事作家之作品評論引得	353
重要參考書目	363

第五章 作品的醫事主題

醫事主題的內容，主要以描繪醫事人員以及病人的眾生相為主，諸如醫事人員的工作體驗，對病人生老病死的反思、醫療觀念的教育及生活習性的導正；還有社會對醫事人員的評價等，皆屬醫事主題的取材對象。依據筆者查閱的資料中，在臺灣最早注意醫事寫作主題的文獻資料，是登載於一九七三年十二月《當代醫學》雜誌由廖運範醫師翻譯的〈醫學與文學〉〔註1〕，以探窺世界知名作家筆下的醫事主題為重點。《當代醫學》雜誌又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與隔年二月刊登鄭泰安醫師翻譯的〈詩與醫學〉，分析國外醫生的醫學詩，內文一開始即追溯詩與醫學的密切關係：

歐洲最早的詩篇之一是阿波羅——詩與醫藥之神——的讚美詩。這絕非偶然的巧合，對古希臘人而言，詩與醫學是密切相關的兩種藝術。

在最古老的年代裏，人類就震懾於詩與醫學所顯現的魔力，美索不達米亞的黏土碑以及埃及的草紙都記載有精彩詩文崇讚醫學、儀器與醫療藥方的調配，同時激勵醫生的醫療工作。〔註2〕

由此得知，醫事主題的寫作與醫學發展可謂是並行發展，由來已久。

透過〈醫學與文學〉、〈詩與醫學〉，可以舉觀世界醫事人員的寫作概況，也可以從中略覽他們在醫事主題的表現，上自十五世紀的賴伯雷（Rabelais）到二十世紀的毛姆，都從他們行醫的經驗中，產生了文學作品。以毛姆為例，他的第一部處女作〈蘭貝斯的麗莎〉（小說），即是取材自醫科四年級至蘭貝

〔註1〕 參廖運範譯〈醫學與文學〉，《當代醫學》1卷2期，1973.12。

〔註2〕 鄭泰安譯，〈詩與醫學〉（二），《當代醫學》2卷2期，頁94，1975.2。

斯貧民窟當助產士的實習經驗；後來的傑作《人性枷鎖》(小說)，以男主角的畸形足詮釋其自卑感。俄國契訶夫的最重要作品之一〈六號病房〉(小說)，描述一個正常人被關進瘋人院裏，活活被打死的悲慘故事，是契訶夫庫頁島旅行的烙印之一，呈現十九世紀末俄國社會的縮影。日本森鷗外的〈性生活〉(小說)，將主角的心理和感情的陰影，依年月順序，嚴肅地解剖，彷彿醫生填寫病歷卡，精細地敘述，是篇描寫官能之作，也是森鷗外自己的性慾史。法國史懷哲的《非洲行醫記》(散文)，是他個人實踐非洲行醫理想的記錄，傳達尊重生命的行醫理念。從以上這些外國醫事作家的醫事主題代表作，我們可以發現醫學與文學之間息息相關，因為二者都關懷著人類的生命與憂患。

日治時期臺灣作家也寫下了不少與醫事主題相關的作品，一九七六年于飛在〈從「無醫村」看日據時代的臺灣醫學〉盛讚：「楊達的〈無醫村〉以熟練的手筆，深入淺出的描敘臺灣沒有醫生的地方的慘狀，是一篇絕佳的『醫學文學』。」〔註3〕一九九四年許俊雅於《日據時期臺灣小說研究》，分析日治時期臺灣小說中「求神治病之風習」、「醫師形象」〔註4〕。至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國時報》閱卷版上，出現了王浩威醫師的〈文學裏的藥石——醫事寫作在臺灣〉〔註5〕，主要針對九〇年代醫生王溢嘉、侯文詠和陳克華，列舉說明他們以醫院或病人為文學題材的專著。本章主旨在探析日治時期臺灣醫事作家筆下的醫事主題，以見文學與醫學的密切關係。

第一節 診斷「臺灣」病症

臺灣的醫事主題最早當可追溯自蔣渭水的〈臨床講義〉(1950：93-95)，這篇文章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發表於《臺灣文化協會》第一期會報，最大的特色是以「臺灣」為病人，書寫一分「智識營養不良症」的醫生診斷書，內容鋪敘條理井然，分四層次進行：首先，依序標列「臺灣」患者的基本資料，藉以回顧臺灣的歷史；其次，依據醫生的病情觀察，敘述臺灣當時人民

〔註3〕 于飛，〈從「無醫村」看日據時代的臺灣醫學〉，《夏潮》1卷7期，1976.10.1。

〔註4〕 參許俊雅《日據時期臺灣小說研究》，頁381~386、634~646，臺北：文史哲，1995.2。

〔註5〕 參王浩威《一場論述的狂歡宴》〈文學裡的藥石——醫事寫作在臺灣〉，頁237~242，臺北：九歌，1994.8。

與政府的心理狀況；接著以診斷內容說明臺灣病態形成的原因與治療的方法；最後開出根本治療的各種藥方。全文主旨是在揭露臺灣社會的陋習，並且提出根本治療法，開創了醫事散文的寫作主題與形式〔註6〕。

〈臨床講義〉開篇即道出診斷的對象是臺灣，其基本資料如下：

患者：臺灣

姓名：臺灣島

性：男

年齡：移籍現住址已有二十七歲

原籍：中華民國福建省臺灣道

現住所：日本帝國臺灣總督府

蔣氏特別標明「原籍：中華民國福建省臺灣道」，由此強烈表明無法承認臺灣已淪為日本殖民地的事實。又患者的「職業：世界和平第一關門的守衛」，從中彰顯臺灣重要的地位與神聖的使命。蔣渭水在《臺灣新民報》發行五周年特輯中曾說明：臺灣人負有作為中日親善媒介、促進亞洲民族聯盟、引導人類走向最大幸福與世界和平的使命；並一再強調臺灣的重要地位，是通向世界和平第一道關卡的鑰匙。

臺灣既居於重要的地位，又負有神聖的使命，卻因罹患「智識的營養不良」症，成為「世界文化的低能兒」，絲毫無力施展作為。內容繼續追溯病根的源起，分別從鄭成功、清朝時期的「既往症」，以及日治時期的「現症」詳細說明，「既往症」是：

幼年時（即鄭成功時代），身體頗為強壯，頭腦明晰，意志堅強，品性高尚，身心矯健。自入清朝，因受政策毒害，身體逐漸衰弱，意志薄弱，品性卑劣，節操低下。轉居日本帝國後，接受不完全的治療，稍見恢復，唯因慢性中毒長達二百年之久，不易霍然而癒。

至於「現症」則有：

道德頹廢，人心澆漓，物慾旺盛，精神生活貧瘠，風俗醜陋，迷信深固，頑迷不悟，罔顧衛生，智慮淺薄，不知永久大計，只圖眼前小利，墮落怠惰，腐敗，卑屈，怠慢，虛榮，寡廉鮮恥，四肢倦怠，惰氣滿滿，意氣消沉，了無生氣。

〔註6〕 〈臨床講義〉的主旨義涵與形式風格，參筆者〈一篇診斷日據時代臺灣社會病症的政治文獻——蔣渭水「臨床講義」探析〉，《宜蘭文獻》45期，2000.11。

一九二〇年代的民族自覺與新文化的提倡，一方面反抗日本殖民主義，一方面也企圖改造舊社會。當時的知識精英，看到「道德頹廢，人心澆漓，物慾旺盛，精神生活貧瘠」的社會病症，多憂心忡忡，亟思有以改造。加上清代以來，「因受政策毒害，身體逐漸衰弱，意志薄弱，品性卑劣，節操低下」；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民風每下愈況，因而改造舊社會，勸導民眾改正陋俗，遂成爲新文化運動者的目標。在蔣渭水的眼中，日治時期的臺灣已病入膏肓，尤其針對「迷信深固」、「風俗醜陋」的民情陋習，有諸多的文字評論與實際改革，如在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民報的〈晨鐘暮鼓〉中，他明示臺灣社會有五項民情陋習，當迅速破除，即：一、祈安建醮；二、補運謝神；三、燒金紙；四、婚葬、聘金；五、吸鴉片〔註7〕。以下就蔣氏筆下的「迷信深固」、「風俗醜陋」等病症逐一探析。

一、迷信深固

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是泛神信仰的民族，天有日月星辰，地有河嶽山川，人有聖賢功德，皆可奉之爲神。農民在勤墾於畎畝之間，對大自然的神威，感到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畏懼，於是引起對天地泛神的敬畏，而加以崇拜。人格化的神，具有超自然的力量，指導人世間的事務，所以對神的權威明顯順服；然而過度的迷信深固，弄到傾家蕩產，誠爲不智的行爲。首先，就「祈安建醮」的革除，蔣渭水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的〈可惡至極的北署之態度〉〔註8〕文中，除對稻江建醮奢侈鋪張深感痛心外，更嚴正籲求打破陋習。同時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北署遊記〉一文中，更直指這些「巴結官僚諂媚神鬼」的死醮「皆是臺灣民族滅族亡家的兆勢」〔註9〕。

其次，就「補運謝神」的革除，一九二四年一月六日的〈入獄日記〉，蔣渭水見農家謝神，有很深的感觸，認爲農家和勞動者、藝娼妓等一般下層社會的無新教育階級，經濟原本拮据，又增添一種神明債，生活勢必更捉襟見肘，因此他感嘆地說：「我們大多數的農民同胞，永沒有自覺出頭天的機會了」〔註10〕。

蔣渭水帶領改革社會的迷信風氣，賴和起而效尤，一九三四年與楊守愚

〔註7〕 蔣渭水，〈晨鐘暮鼓〉，《臺灣民報》3卷1-4號，1925.1.1~1.4。

〔註8〕 蔣渭水，〈可惡至極的北署之態度〉，《臺灣民報》2卷25號，頁6，1924.12.1。

〔註9〕 蔣渭水，〈北署遊記〉，《臺灣民報》187號，頁7，1927.12.18。

〔註10〕 蔣渭水，〈入獄日記〉，《臺灣民報》2卷9號，頁11，1924.6.1。

共具名發表〈就迷信而言〉於《革新》(大溪革新會)，即就迎神一事，道出「費了島民好多的一注錢財」(2000.三：101)的浩嘆。又在〈鬥鬧熱〉、〈赴會〉兩篇小說記載了香火鼎盛的情況。一九三七年發表的〈鬥鬧熱〉，賴和以近代知識分子的觀點，特就貧苦民眾為迎神賽會不惜一擲千金的陋習和愚昧，提出了嚴正的批判，小說中透過人物丙說：「在這時候，大家救死且沒有工夫，還有空兒，來浪費這有用的金錢，實在可憐可恨，究竟爭得什麼體面？」(2000.一：37)情節又寫道：「所以窮的人，典衫當被，也要來和人家爭個臉皮。」「西門那個賣小點的老人，五十塊的老本和一圈豚，連生意本，全數花掉，還再受過全街的笑話。」(2000.一：38)賴和刻劃了民眾為了迎神賽會弄得傾家蕩產、一貧如洗的窘境。

雖然過度揮霍、鋪張、豪奢的迷信行為，的確必須加以淘汰破除，但在農業社會以及教育不普及的情況下，民間信仰仍有其存在的作用。看天吃飯的農民，面對天的呼風喚雨、地震山搖、洪水滔天、赤地千里等自然現象，潛藏著一種不可理解的神秘力量，無不引起他們的恐懼，也感到自己的渺小無能，難以與強大的自然抗爭，於是認為有一種超自然的靈性和神祕的力量，主宰著人類的命運，進而產生命定論或宿命論的觀念，這種天命思想，成為農民宗教信仰的主體。正因為信仰有堅定民眾奮鬥進取的信念，以及撫慰民眾忐忑不安的心靈等作用；如果一味的破除其信仰行為，等同於拆除其身心安頓的溫暖住所。賴和在〈赴會〉中有一段令人省思的話說：

他們嘗盡實生活的苦痛，乃不得向無知的木偶祈求不可知的幸福，取得空虛的慰安，社會只有加重他們生活苦的擔負，使他們失望於現實，……只就迷信來講，不僅不見得有些破除，反轉有興盛的趨勢。啊，這過去使我不敢回憶。而且迷信破除也覺得不切實際，使迷信真已破除了，將提供那一種慰安，給一般信仰的民眾，像這些燒金客呢？這樣想來，我不覺茫然地自失，漠然地感到了悲哀。(2000.一：64-65)

字句間透露著體貼民意的心理支持，「使迷信真已破除了，將提供那一種慰安，給一般信仰的民眾」，信仰確實帶給勞動者精神的寄託。

在日治時期的其他作品中也有不少反映民間迷信的主題，如蔡秋桐的〈王爺豬〉一文，敘述鄉人信奉王爺公是合境的守護神，五年一度舉行宴請王爺公，家家戶戶殺豬宰羊，大張旗鼓，極盡鋪張之能事；而一些貧戶「想要省

些稅金來加買些金紙，反轉（反而）受著加倍的罰金。」〔註 11〕豈料祭典當天，遭當局以私宰逃稅為由加以取締，「祭神本在求福，竟反而惹禍。作者除了揭露日帝的醜惡嘴臉外，是否亦在嘲諷封建下的迷信陋習呢？」〔註 12〕朱點人的〈島都〉〔註 13〕，廟寺建醮，史明的爸爸被地方頭兄強迫樂捐，因無力繳納，只好賣兒來給付，最後在憤恨羞愧中投河自盡。建醮本來是要庇佑世人的平安，而今卻造成了一家人離散死亡的悲劇，批判「迷信深固」的意旨十分鮮明。

二、風俗醜陋

（一）喪禮、婚禮鋪張

就喪禮改革而言，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蔣渭水母親病逝，他為了打破迷信革除陋習，斷行改良遺族的喪服，不用地理師選擇墓地，辭退親戚朋友的金銀紙燭、花車牲醴或弔祭等〔註 14〕，而且不發訃聞，只於《臺灣民報》上刊登廣告〔註 15〕。十月六日出殯當天，蔣渭水還將發放銀紙的俗例，改為散布二萬張題名為〈喪禮口號〉的傳單，其內容為：「打破妄從迷信，排除守舊陋習，破除日師堪輿選擇，反對僧尼道士誦經，排斥做功德、糊靈厝，反對燒銀紙、還庫錢，排斥燒轎乞水，廢止弔祭做旬，革去點主祀后土，破除誥封提銘旌，廢除無意義牽調啼笑，反對多喧嘩鑼鼓吹。」〔註 16〕在喪禮鋪張的民風盛行之下，蔣渭水率先提倡喪禮的改革並且身體力行〔註 17〕，深富革新的勇氣與科學的精神。又賴和在一九三四年曾與楊守愚共同具名發表的〈喪禮婚禮改革的具體案〉（2000.三：102），即以社會最下層的經濟程度來做標準，主張婚喪皆宜從簡。小說中如呂赫若〈逃跑的男人〉，即敘述家族借

〔註 11〕 蔡秋桐，〈王爺豬〉，收錄於葉石濤、鍾肇政主編《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 4——薄命》，頁 311，臺北：遠景，1997.7。

〔註 12〕 同前註，頁 301。

〔註 13〕 朱點人，〈島都〉，收錄於張恆豪編《臺灣作家全集——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147~162，臺北：前衛，1994.10。

〔註 14〕 參〈地方通信：臺北蔣母之葬式擬廢一切陋習〉，《臺灣民報》280 號，頁 6，1929.9.29。

〔註 15〕 同前註，頁 5。

〔註 16〕 〈地方通信：臺北出葬放銀紙換做散傳單〉，《臺灣民報》282 號，頁 6，1929.10.13。

〔註 17〕 參〈地方通信：高雄先覺者改良葬式〉，《臺灣民報》263 號，頁 7，1929.6.2；〈地方通信：高雄張氏令堂舉告別式〉，《臺灣新民報》331 號，頁 9，1930.9.20。

錢辦理父親喪事，盛大無比，「總共花了十幾萬圓經費」〔註18〕，卻也從此背負大筆債務，很明顯的作者將改革喪禮習俗寄託於情節之中。

另外，賴和在〈善訟的人的故事〉亦曾出現墓地好風水庇蔭子孫的迷信觀念：

我們的社會，不知由那一時代起，個個都有風水的迷信，住的厝宅不用說，掩臭的墳墓，講也會致蔭（庇蔭）人，做官發財，出好子孫，食長壽數，都由風水而來；所以一塊真龍正穴，值得千金萬金。這樣事是限在富戶人才做得到，貧的人雖提不出這樣價錢，逐個都有傲倖之心，像買天財票一樣，提出小小成本，抱著萬一的希望，想得著大大的天財。而且死了的人，也不能不扛去埋葬，掩成難於保存的屍體，同時也可藉此來致蔭（庇蔭）自己發達，這樣事誰不肯為？不幸家裡沒有死者可葬的人，他就別想方法，洗骨遷葬，把失去的希望，重再拾了起來。（2000.一：233）

賴和諳於臺灣的民情風俗，對於鄉紳村老重視墓地風水的描繪，極富地方民俗色彩。類似的故事也發生在呂赫若的小說〈風水〉〔註19〕，善良的老人周長乾爲了永保父親遺骨的完整，決定洗骨遷葬，以慰其父在天之靈；卻遭弟周長坤的極力反對，理由是根據地理師的鐵口直斷，父親原本的墓地風水能給予次房非常榮華富貴的陰德；到了接二連三的不幸降臨周長坤家時，他強自挖開母親的墳墓，將遺骸暴露天日，人道的荒廢與風水的迷信顯露無遺。

就婚禮的改革而言，蔣渭水一直站在尊重女性的立場而提出改革觀點，譬如他主張嫁娶要聘金有如買賣行爲，視女子做商品，太蔑視女子的人格。又在《臺灣民報》發表〈衛道家的淑女與妓女〉一文，將「衛道家的淑女」與「妓女」相提並論，因爲這兩類女性的人格同樣慘遭嚴酷的待遇、主體意志也完全被剝奪宰制，文章主旨是要積極喚醒女性意識，提倡女性選擇自己所愛的婚姻，內文說：

妓女是沒有選嫖客的權利，衛道先生們所說的淑女，也是沒有選擇終身配偶的權柄。妓女如想反抗，總是嫖客的黃金閃耀，想眩暈老板，拿起鞭笞把她打個如綿羊一般的溫馴，臘白白的橫臥床上，做嫖客的取樂器具。衛道先生們的淑女也常常被她的主婚者糟蹋，嫁

〔註18〕 呂赫若，〈逃跑的男人〉，收錄於林至潔譯《呂赫若小說全集》，頁166，臺北：聯合文學，1999.5。

〔註19〕 呂赫若，〈風水〉，收錄於前註書，頁301~318。

到很不稱意、很嫌惡的男子，雖想反抗，但衛道先生手裏拿著舊道德的鐵鏈比搗母的鞭笞還要利害呢！只好忍耐過妓女似的做人家取樂器械，嚶嚶的啜泣，苦痛一世。……在老板的眼裡，妓女是一種商品，由她可以生出很多的利益。在衛道先生們，淑女也是一種奇貨，可以和較自家著名的望族、勢家、富翁聯婚，冀得一世享不盡的幸福。（黃煌雄《非暴力的鬥爭》，頁55）

距今八十年前蔣渭水便已提出自由戀愛的主張，不愧是臺灣早期的「先知先覺者」（註20）。

（二）嫖妓豪賭

蔣渭水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一日民報上，發表〈生女為娼妓生男為嫖客〉（註21），沉痛呼籲要「廢娼」，希望大家努力合作，務使這樣殘害青年男女的娼妓及早消滅淨盡，此舉不但是臺北市民的幸福，也是臺灣全體的幸福，更是世界人道上的貢獻。另外，他在〈再遊北署〉「兩個可憐的少女」這個段落，描述了個人對兩位娼婦的同情憐憫，以及嚴厲痛斥無賴漢對娼婦的刻薄對待：

我的對面客房有兩個妙齡少女芳年在十六七歲，乃是貸座敷無鑑札的娼婦，承這裡主人的美意，留宿一禮拜，做他們肉體上的休養。……她拿著掃帚在掃除的姿態宛像葬花的黛玉一樣真是「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慧中」。她們若生在富家裡，豈不是千金小姐，窈窕淑女嗎？她們不幸而生在貧窮的家庭，就墜落在煙花隊裡，甚至走到這樣田地，這並不是意味她們的賢和不肖而正是貧與富的寫實，我很可憐她，同情她，也很願意為她犧牲，然而不近人情的無賴先生，對待她們，很是刻薄冷嘲熱罵，我聽著很憤慨，向無賴漢們說：「朋友！無賴漢笑醜業婦，其實是龜笑鰲無尾，這些醜業婦和無賴漢，——（野雞和鱸鰻）——都是同一的母體，——帝國主義所產生的，換句話說：你們倆都是帝國主義產生下的畸形兒，——你們的兄弟，還有匪徒，強盜，盜賊，乞丐和軍閥的傭兵，——你們應該要同病相憐，同氣相求，豈可互相仇視，何苦相煎太急！」這一抗議的結果，卻恢復一時的安寧秩序，但是弱小民族的可憐蟲何嘗會大徹大悟

〔註20〕黃煌雄在1976年左右，撰寫蔣渭水評傳，稱蔣氏為「臺灣的先知先覺者」。見黃煌雄《蔣渭水傳——臺灣的先知先覺者》再版序，臺北：前衛，1995.7。

〔註21〕蔣渭水，〈生女為娼妓生男為嫖客〉，《臺灣民報》2卷2號，1924.2.2。

呢？（1950：15）

同處帝國主義的壓迫，同胞之間應該要「同病相憐，同氣相求，豈可互相仇視，何苦相煎太急！」這段話充分流露蔣氏對娼婦的關懷與尊重。〈臨床講義〉謂臺灣「罔顧衛生」，尤其缺乏公共衛生設施所造成的娼婦染患梅毒的現象，應該也是蔣渭水積極主張廢娼的原因之一，參考日本衛生隊實查記錄可見：「臺府衛生，房屋周圍或院內，流出污水，又到處滯留成泊，或人豚雜居，雖有公共廁所之設備，而往往到處散放糞便，惟市中日本人鑿井之噴水，以鐵管供給飲用，而其桶器極為不潔，娼婦到處暗出，其染惡性梅毒已入第三期，侵蝕至骨者，市內甚多。」〔註 22〕基於對女性人格的尊重以及生理的健康為由，廢娼誠為當務之急；由此可見蔣渭水對封建宰制下女性的悲劇命運十分關注。

島民性格的另一特徵，是牆草般的擺盪、投機、勢利，以金錢為本位，將倫理價值貨幣化。賭博風氣的盛行則與倫理價值的貨幣化息息相關，蔣渭水在〈蕃女的教訓〉一文中，暴露出一個極為嚴重的社會風氣，此即倫理價值的貨幣化：

現在一般人的生活——衣食住的向上，都是經濟上——產業商業的發展所致。而那經濟上發展之對象，不是普遍的民眾，是資本家自己的資本，而普遍的民眾反做了那班人們發展上消費的對象而已。所以在這社會，不論做甚麼事，政治或教育，乃至於私人的交際，也一定以貨幣的多寡為評價的標準，而成了一個倫理的原則。（黃煌雄《非暴力的鬥爭》，頁 52）

由於倫理價值的貨幣化，在「物慾旺盛」的風氣下，變成一個如蔣渭水說的「生女為娼妓，生男為嫖客」的社會，在功利取向濃厚的環境裡，追逐財富，導致投機致富的心理，因此「賭博」成了臺地不良風俗之一。如賴和〈不如意的過年〉說：

說到新年，既生為漢民族以上，勿論誰，最先想到的就是賭錢，可以說嗜賭的習性，在我們這樣下賤的人種，已經成為構造性格的重要部分。暇時的消遣，第一要算賭錢，閒暇的新正年頭（過年期間），自然被一般公認為賭錢季節。（2000.一：83）

〔註 22〕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頁 30，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7。此處譯文引自陳勝崑《近代醫學在中國》，頁 134，臺北：當代醫學雜誌社，1978。